



文论天地

开掘传记片的独特魅力

晓曙光 杨晓云

人物传记片是电影的类型之一，它以故事片的形式和艺术化的手段浓缩了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各个行业著名人物的人生精华，将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展现于大银幕，让观众去评判、体会，从中得到启迪。不同国度的观众对一部传记片的理解可能不同，不同层面的观众对同一部传记片的理解也可能产生分歧，构成了人物传记片独特的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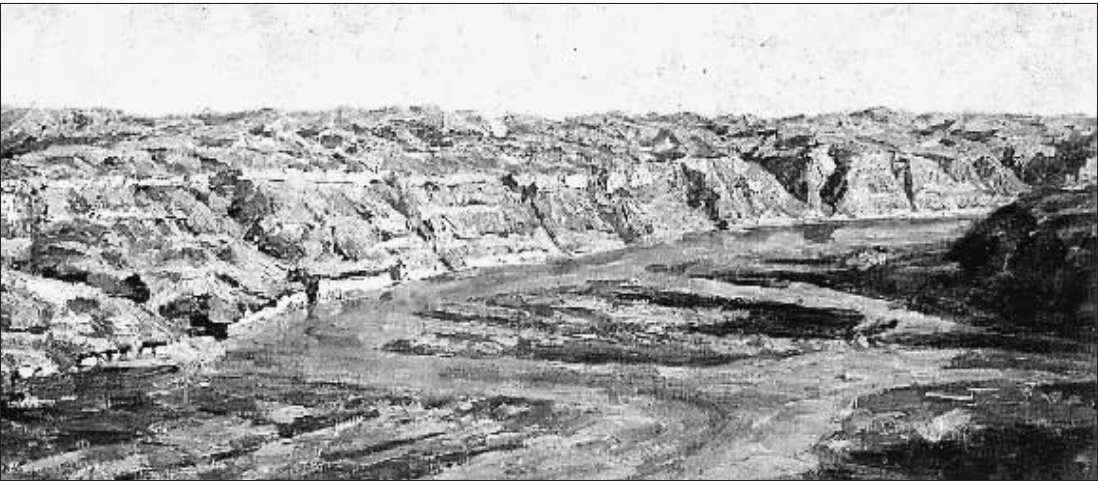
《公民凯恩》、《少年林肯》、《莫扎特》、《美丽心灵》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传记片的经典之作。在中国，人物传记片同样是具有重要而独特价值的片种，“文革”前的《武训传》、《李时珍》、《董存瑞》、《白求恩大夫》等，新时期的《从奴隶到将军》、《李四光》、《孙中山》、《周恩来》、《焦裕禄》、《将筑英》、《孔繁森》等，新世纪以来的《邓小平》、《吴清源》、《梅兰芳》等，均系脍炙人口的上佳之作。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更涌现了多部优秀的人物传记片如《邓稼先》、《愚公移山》、《铁人》、《孟二冬》、《潘作良》、《袁隆平》等。也就是说，经过多年发展，国产传记片表现手段愈加娴熟，表现对象愈加多元，题材上已从政治人物扩展到非政治人物、从历史人物扩展到当代人物。这种变化带来传记片创作空间的拓展，为国产人物传记片进一步之繁荣提供丰富的可能性。

人物传记片作为以历史上杰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影片，它一方面受到历史真实性的制约，必须以历史材料为基础塑造典型人物、体现典型环境。也就是说，以真实性人物的事迹原型作为创作约束正是传记片与一般电影创作的差异性所在。毕竟，传记片最大的功用在于讲述传主的生平事迹，因此所记“真实”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历史”、“表现真实”应该是人物传记片的基本审美规范和创作要求。但另一方面，电影的艺术和审美本性决定了电影的虚构本质，以情感、感性之力量赋予人以美与崇高。国产传记片多为典型的真人真事题材，天然面临沉重的“真实性”的负荷。固然传记片中的英模人物事迹不能胡编，但生活中的原型人物进入电影，最终是要求从历史真实达到艺术真实的可信性，用情感的力量使人受到精神的感召和震撼。总之，不可忽略艺术形象本身的真实性，因为当原型在银幕呈现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如影片《愚公移山》虽然呈现的是生活化的风格，但生活化不是原生态的呈现，而是源自生活的艺术提炼，是艺术的智慧。主人公李双良那些非常朴素的生活形态，都不是我们常见的概念性的东西，而是新颖的、独特的。影片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挖掘到人物的精神面貌、灵魂实质，从而从内心深处打动了观众。影片《潘作良》的成功也在于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虚构和加工。影片选择 4 个典型事件：河西村农民在土地二次承包中没有分到土地事件体

现的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冯大娘事件体现的是他作为人民公仆、作为人民儿子对百姓疾苦的体察，体现为民请命的情感。齐春英案子代表对生命、对人性践踏的案子等。这些事件在影片里面组成情节实际上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

当下中国人物传记片的一个最大突破在于，从过去表达一种高大全，慢慢转向了非常个人化的表述，注重个体体验层面。比如《铁人》，它采用跨越式的叙述方式，即黑白与彩色之间的色调跨越，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力图将新中国 60 年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沟通，连接和沟通两个 30 年的内在，实质就是一种立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属于前 30 年的，也属于后 30 年的，甚至也属于我们当下的。人物传记片的这种“当下性”尤其重要。所谓“当下性”，就是通过我们传记片人物的倾向和当下主流精神进行对接，以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境界、性格特征和当下话语进行沟通，填补我们当下所缺少的精神，引起观众心里的共鸣。比如影片《潘作良》，以潘作良的目光去看民生疾苦，不回避痛苦和磨难，将苦难转换成一种社会力量、国家力量、人生力量、道德力量。通过潘作良这个艺术形象，让观众看到了当下需要我们的公仆为民作主，为民代言，为民请命，为民办好事。针对重权欲而轻为民的社会现象，填补了当下话语的缺失。

就当下英模人物传记片创作而言，最重要的是导演的自我意识，他对人物的独特理解，从“人”的角度真正理解英模人物、塑造英模人物。艺术创作的中心是“人”，“人”也是传记影片创作的中心。传记影片要表现人物的精神崇高，但最高的崇高是来自于平凡，最亲近的崇高是在于情感。切忌把崇高当成拔高。最亲近的崇高是自情感而来，而不是理性投射出来的。英模人物传记片子不能就事论事地表扬好人好事，而要致力于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注重人物细节和人格、性格之刻画。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形象化的通讯报道，



母亲河（油画）

孙会忠作

中国革命的百年风云潮起潮落，曲折坎坷，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又一次将观众的视线拉向了历史的深处，再一次显示出革命历史题材独特的精神力量与美学魅力。

首先，该剧力图再现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以史诗的风格追寻历史演变的轨迹，探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性。近 30 年的风云际会，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剧中都得到了具体、生动、形象的再现，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段从各个方面展开的角逐和较量，分分合合，大开大阖，其残酷、悲壮的历史纠葛在剧中立体地展现了出来。

历史不仅仅是海平面上可见的冰山，可能更多的是海平面以下更为庞大和隐秘的部分。这些侧面的、隐秘的部分不仅是历史的本来构成，更重要的是，对它们的叙述本身就是解释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剧作把人们的视线从惯性的思维定势中拉出来，投向那些被忽略甚至被遮蔽的领域。

对那几十年的历史，《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有选择的，它把焦距对准了中国现代史上两大重要的政治力量——共产党与国民党。因此，与其说是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沧桑变化，不如说它是在讲述这两大政治力量戏剧性的命运，它们的合作、斗争、成败、荣辱、沉浮与去留。而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求道，求“沧桑”的“人间正道”。因此，剧作是在充分的社会背景中展开叙述的，作品环环紧扣，将共产党人由弱到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艺术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这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来自一个个共产党人鲜明的性格形象所昭示的这个政党的宗旨，她以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潮流而最终得到历史理性的垂青与选择。这是响彻全剧的主题乐章。

其次，这部连续剧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家庭、个人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作品将重大事件作为结构线索，将许多历史人物角色化，演绎两个家庭的众多人物在历史关头不同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剧作在戏剧冲突上做好了文章，使得整个作品的推进悬念丛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剧作表现的虽然是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但其主要的戏剧冲突实际上是在杨家 and 瞿家这两个家庭中进行的。剧作不再沿用敌我二分法

评《人间正道是沧桑》

的冲突模式，而是引入了家族、血缘、亲情、伦理、新旧、师生、同学等关系元素，当这些关系元素又随着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分合变化时，又出现了更多的衍生性与生长点，其冲突的可能性、多变性特别是其内涵和悲剧性就更加丰富。而越是冲突激烈复杂，越是看出理想、信念、道路以及历史理性的强大力量，也越是能“逼”出人性中深层次的东西，看出在沧海横流中个人、家庭命运的起伏变化及其意义。

第三，该剧塑造出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涵义丰富的人物形象。《人间正道是沧桑》故事时段长，空间转换频繁，冲突复杂多变，人物形象众多，编导倾力塑造由众多表演艺术家精彩演绎的瞿恩、杨立青、杨立仁、瞿霞、林娥、范希亮等则更是一个个性格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

剧作是将瞿恩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来刻画的。他热情、友善、善解人意，他也有热烈而又理性的追求。通过他，我们感受到一种理想对人格的提升，感受到共产党人不可抗拒的感召力。相比较而言，编导是将杨立青作为一个成长的共产党人来刻画的。当杨立仁已投身国民革命时，立青还是一个浑不知事、到处惹是生非的小青年。他在革命斗争的磨砺中，在各种复杂的家庭、情感冲突中渐渐成熟，成为一个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个具有多方才能的军事人才，不断赢得他人理解、赞赏和尊敬。他言行果断，智慧超群，让观众感到亲切、真实，充满了亲和力，加深了人们对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剧中，杨立仁是作为立青的对立面来刻画的，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在很大程度上隐喻了全剧的主题。同胞兄弟，因为道路的选择而成为敌人，一个在逆境中成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个虽然早熟，也才华过人，虽恪尽职守，孜孜以求，但却一败再败，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的起落成败的对比既与个人相关，又是超越了这个人的历史的必然。作品总是力求通过个性的刻画挖掘其背后的社会与历史的必然性，保持了性格刻画的思想高度。

《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长达 50 集，但无论是镜头的运用，色彩的安排，道具的制作，都全力以赴，给人以美的视听享受。正是这些看似技术层面的精益求精，才会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氛围，让观众在其中重温历史的风云，接受思想的熏陶。



新作鉴赏

柳州打造音乐电视剧《刘三姐》

缉毒英雄罗金勇和他的妻子罗映珍的事迹，曾因去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而广为人知。尽管如此，谈到黄晓萍为此而采写的报告文学《真爱长歌》（云南教育出版社），仍然感到新鲜，并备受感动。

作品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其主人公罗金勇罗映珍夫妇事迹本身的魅力。作为一个缉毒民警，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都可能遭遇生命的威胁。罗金勇选择这一职业本身，已经堪称勇者。难得的是，在节假日的路途上，在手无寸铁、敌强我弱的情下，仍然挺身而出，和犯罪分子做殊死的斗争。而他的妻子罗映珍同样毫不畏惧，在丈夫身负重伤时，和群众一起抓住了其中一名罪犯，亲手把他绑上移送公安机关。最令人赞叹的是，在罗金勇负重伤的日日夜夜，罗映珍以不离不弃的大爱，用 1000 多封饱含深情书信，呼唤儿近“植物人”的丈夫，最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罗金勇罗映珍夫妻，是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光辉、洋溢着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典范。

塑造社会主义的时代英雄，以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文学

近日，刘三姐的故乡——柳州携手北京派格太合传媒公司正紧锣密鼓共同打造电视音乐连续剧《刘三姐》。该剧由郑万隆编剧，孟可、科尔沁夫、林夕、金培达等著名音乐人联手担纲创作。

传说中，刘三姐在柳州传歌，在柳州成名，最后在柳州成仙。1959 年柳州彩调团创作演出彩调剧《刘三姐》，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区刘三姐文艺大会演”；而后该剧三进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喜欢；公映于 1961 年的电影《刘三姐》更是在世界上受欢迎的新中国电影。

电视连续剧《刘三姐》在原彩调剧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在主题、人物、结构等方面作了重大改动。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为传说记载刘三姐生活的唐代，剧中首次将历史人物柳宗元和传奇人物刘三姐放置在同一时空里，表现以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山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该剧通过刘三姐传歌过程中的不平凡经历，道出“歌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心随歌动，人随歌变”的主题。（人文）

平凡素朴的警界英雄

——报告文学《真爱长歌》读后

陈建功

责无旁贷的使命。作家黄晓萍在罗金勇夫妇的事迹面前表现了足够的敏锐。她先是被感动，随即投入了艰苦的采访。从书中不难看出，通过长时期的接触，黄晓萍已经和罗金勇夫妇成为情感相通、休戚与共的朋友。作家不仅挖掘到了罗金勇罗映珍的英雄事迹，而且也挖掘到了这一对夫妻之间那种微妙细腻的情愫。这使得作品中的罗金勇夫妇，既英雄气概，又儿女情长；既有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无疆，又有对妻子对家庭的情意绵绵；既催人向上，又感人至深。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可敬的、可亲的，他们走到我们面前的同时，就走入了我们的心间。应该说，这不能不归功于作家采访的深入，归功于她对英雄人物理解的深度。

在作家笔下，罗金勇绝不是一个孤单的英雄，他是云南边陲英雄民警的一分子，是英雄集体的一员。许许多多缉毒民警，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而献身。书中一一展示了这些烈士们的风采，并做了简短的介绍。这一张张纯朴的，甚至有些如

青春文学这个提法并不新鲜。照我的理解，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就不会有衰老，因为只有文学精神不老，作为载体的文学样式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就文学本身而言，没有青春与老年之分，今天之所以特指青春文学，是那些近年崛起的文学新秀，他们是活跃在当今文学市场的生力军，由几年前的萌芽与沉积，到今天已颇具气候，形势十分喜人。

时下，把文学当作时尚彩排一样来消费的大有人在，文学不再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产物，而是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机械完成，至于文学思想与品位也就很少顾及到了。文学思想也许是“沉重”的，但可以保证人们不至于因世风而左右摇摆，导致精神失重。青春文学少有传统文学固有的那份思想的厚重，比较符合当下那些看卡通长大的孩子们的心理，可算是他们倾诉感情的得意渠道，或者是一种现实生活所不能尽情体验的心理上的补救与尝试吧。

我仿佛觉得，那些青春文学写手们正置身于现代化的手工作坊里，日夜纺织着属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他们大踏步地驶上文学快车道，迎合了当下快餐一样消费的文学阅读，很难说这就是文学的繁荣。缺少了精神内涵的文学，对于那些处在成长中的读者来说，就不能打下良好的精神底子，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此一来，精神的缺失导致文学成为既不能励志壮怀，也不能够感动人心的闹剧。文学一定要给人以文学情怀上的关照，而文学情怀的普及及需要诞生在一个淡泊名利、向往纯真、渴求真理、胸怀理想的时代，这才是文学成长的大气候。如今，青春文学步入市场，不能不说有利益上的驱动。时尚阅读虽可刺激文学消费，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出版业兴旺发达，毕竟我们还没有出现像《哈利·波特》那样的足以风靡全球的作者与作品。青春写手们不过是充当了市场的供应商。文学完全有可能畅销，但真正鼓动人心的畅销文学与功利性商业操作大不一样，两者有质的区别，而市场的热闹未必就是文学的幸运。

文学负有历史责任，担负着改进社会

的使命，需要跟大众同呼吸共患难，唯功利性毕竟不是文学的出路。文学在市场中“变脸”，迎合的是商业需求。文学也要面临“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筛选。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大众读书求知若渴的大气候，而青春文学的写作也没有更好地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文学可以占有市场，但并不能证明文学深入人的心灵。青春文学写手抛开传统的写作模式，另起炉灶，自行构建一个所谓的“乌托邦”也未可知。造成的文学意味着违抗，至于时尚彩排式的文学有着怎样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学低迷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青春文学写手恰恰处在一个文学阅读空气非常稀薄这样一个时期，他们未必是在守望文学园地，而是市场需要他们这样做。古往今来，文学圈向来不与名利为伍，只有不惜代价的文学痴迷者，才可能筑就文学之大厦。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没有哪一部是靠商业运作成就起来的。文学的商业化无论对青春文学也好，还是对传统的文学创作也好，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正因如此，文学圈出现了分流、演变。市场对于搞写作的人来说，既可以是培育，也可能意味着毁灭。尤其对于较少受到传统熏陶的读者来说，肤浅的阅读将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功利性写作单从商业角度看，也无可指责，倒是浮躁的阅读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青春文学的滋生和铺张。市场孵化出的决不仅是初生牛犊的写手们，还有抛弃传统文学的新一代读者。

如果青春文学写手们的作品没有使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没有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的热情和奋斗的力量，那就不是优秀的文学。青春文学作品可能各领风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不能担当文学的重任，肤浅的阅读将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功利性写作单从商业角度看，也无可指责，倒是浮躁的阅读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青春文学的滋生和铺张。市场孵化出的决不仅是初生牛犊的写手们，还有抛弃传统文学的新一代读者。

好自己文学之路。

孩子般单纯的面庞同样使我感动。罗金勇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即使在孤身一人和歹徒搏斗的时候，他的身边，不仅有妻子罗映珍，而且有举着锄头、呼喊者前来相助的村民们。在罗金勇负伤后，党和政

府各级领导，广大群众纷纷相助，汇聚成了爱的洪流。《真爱长歌》在处理英雄个人和英雄集体、英雄时代的关系上，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在时代飞速发展、思想观念迅速更新的今天，一切都仿佛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在不少人眼中，许许多多我们曾经奉为圭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都成为“过时”、“陈旧”的代名词。然而为了理想和正义而献身的时代过去了吗？没有！罗金勇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不离不弃、执着忠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还有吗？有！罗应珍也用自身的所为证明了这一点。“乱花渐欲迷人眼”，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经历了岁月淘洗和风浪销蚀的精神之光，如理想、奉献、忠贞、爱情等等，是永难衰败的，它们仍在人类情怀的最高点熠熠闪光。

我们要感谢罗金勇夫妇，是他们以传奇的爱情为我们证实了精神的魅力；也要感谢黄晓萍，是她以独具的敏感和真切的情感，把这闪光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

当代文学理论的辨析

陈 诚

理论学派，即“唯物派”、“实践派”、“科学派”、“审美派”、“宏观派”、“形式派”、“生态派”等，并对各自的研究框架、理论逻辑、思想基点、学理范畴进行了客观分析，这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颇具启迪意义。

反思精神构成该书写作的底蕴。面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各种“转型”说，强调自身的文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向内转”或“向外转”，而是如何实现“自转律”与“公转律”统一的观点。无论文学的“过度功能化”还是“去功能化”，都存在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危险。该著在审美转向、意识形态、文化研究、文学主体性等问题上，大大强化了科学反思的力度。该书对于总结和反思我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引导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该书贯彻科学的理论方法，对“文学理论学”的论述和对文学理论学派的解析，突显了理论研究的科学素质。面对文学理论合法性的危机，“文学理论学”从“元理论”的高度，对“何为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应当怎样”这些基本问题给予了科学回答，展示出著者的理论自觉性和学术责任感。该书初步划分了我国当前主要的文学

